



“复刊至今，倏忽37年。37年来，我见证了报社翻天覆地的变化；亲历了广告从无到有、报业的不断跨越发展；享受了生活由苦到甜的无比欢乐。”

六十华诞忆复刊

□ 尧毅

今年是《达州日报》创刊六十周年。面对由一报发展为三报一网两刊；面对从几幢低矮破房变为6000多平方米的智能化报业大厦；面对告别“铅与火”、“笔与纸”的现代化编印系统；面对从满目疮痍发展到职工居有房，住在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中，我为报社如蛹化彩蝶般的嬗变而欢欣鼓舞，并为她将嬗变得更加令人神往而由衷高兴。

报社发展到今天，实属来之不易。单说复刊前后那段时间吧，就够人感叹不已的了！

艰难起步

1974年3月，当时的达县地委报经省委批准，决定《通川报》《达州日报》前身）5月1日复刊。这距1970年3月28日停刊已经4年了。停刊后，报社人员各奔东西，办公房屋、用具被

占用，印刷设备被搬走。要在两个来月就出报，这的确是摆在通川报人特别是总负责人刘云杰同志（其他二位领导未到任）面前的严峻考验。面对重重困难，他没向地委叫苦，坚定不移地筹划、指挥着复刊的全盘工作。

其时，依靠原地委报道组过来的高文舫（原报社编委）、朱浩然、曾天海、王大江、陈琼芳、彭朝贵同志抓筹备起步工作；同时，调回原报社骨干黎志勉、何全堂、陈国亮、杨利华等，并从各县委报道组等抽调人员组建采编队伍。当时，个别已报到的同志见办报条件十分艰苦，加之认为办报风险太大，借故请假回去就不来了。但绝大多数同志都以苦为乐，个个雄心勃勃，干劲十足，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如期把报纸好好地办出来。

外出取经

办报的头等大事是要掌握好宣传什么，如何宣传。复刊之时，正是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时候。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办报，真是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，动辄得咎。

为了把报道思想掌握好，把报道方针制定好，3月上旬，刘云杰同志就派高文舫、米凤洲（原编委）、杨德福和我前往成都、绵阳、万县等地取经。主要是了解各报的领导体制、机构设置、报道思想。3月下旬我们回到报社向

领导汇报后，领导决定内设机构为：组版编辑组，含美术摄影、校对组、资料室，共11人，由高文舫负责；政治时事组（负责编上层建筑稿件），含收讯室，共7人，由米凤洲负责；地方新闻组（负责编经济基础稿件），5人，由樊勇修（原编委）负责；通采组（相当于后来的群工部和记者部），10人，由尧毅负责；办公室3人，由朱浩然负责。到此，所有人员按部就班，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不再是临时要人随便抓了。

狠抓通讯网建设

当时党报的办报方针是“全党办报、群众办报”。通采组成立后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一手组织地方稿件，一手抓恢复发展全区通讯网。为了尽快在全区铺开通讯工作，4月8日至10日，原达县地委宣传部和报社联合召开各县委报道组长会议，会上提出了恢复发展通讯队伍及采写地方稿的明确要求。从4月底到5月底，渐有来稿。据宣、开、万三县统计，共来稿136件，用稿10件，说明来稿的质和量还跟不上报纸的需要。

当时，报社真正把通讯员视为“上帝”。对其来稿不仅每篇必读，记下优缺点，符合报道要求的及时送有关编辑组。有的稿件还集体讨论，意见集中后，或直接给作者回信，或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写综合退稿信，打印后寄给

每个通讯员。为了更有效地提高通讯员的政治、业务水平，1974年10月《通川报通讯》创刊，32开，70来页。第一期印800份；第二期2000份。1975年改为双月刊，最末期发数达2500-3000份。其内容含当前报道意见、新闻基础知识、好稿评介、优秀通讯员、应注意的问题等。每期《通讯》从新华印刷厂拉回来后，通采组全组动手，写信封、装刊物、刷浆糊。封好后，就用农村装牛草那样的大稀眼背篋，你争我抢地把一背背刊物背到邮局去寄。

通过一系列扎实工作，通讯员队伍发展到两三千人，复刊之初的“稿荒”彻底解决了，稿件质和量都有显著提高。据《通川报通讯》1975年4期表载，当年1至6月单是文字稿来稿即达9715件，用稿640件，用稿率为6.85%。

复刊至今，倏忽37年。37年来，我见证了报社翻天覆地的变化；亲历了广告从无到有、报业的不断跨越发展；享受了生活由苦到甜的无比欢乐。在纪念报纸创刊60周年的时候，欣喜看到报社党组率领全社职工，正在深化改革中昂首阔步向更美好的明天挺进。作为当年复刊的参与者，我感到格外欣慰，格外开心。（作者系达州日报原党组副书记）

铭刻在心

苦乐萦怀忆采访

□ 樊勇修

里有点“悬”。但想到作为代表报社的记者，是一件很光荣的事，也是对自己一个极好的锻炼，便下决心一定要深入基层，深入实际，深入群众，克服困难，完成任务。将近60年的时光过去了，很多事情已经淡忘，但50年代作记者经历的苦与乐，却铭刻在心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夜伴“棺材”

在青花乡采访革命老妈妈张素英时，她家人多房少，没地方住。她们劝我晚上回乡政府住（张妈妈家距乡政府约2.5公里路），但我坚持要住在她家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也便于获取第一手素材，摘取张妈妈闪光思想的火花。没办法，她们只好安排我在她们院子里的堂屋住下，用两条长板凳放一床凉巴棍，再垫些稻草铺上棉絮就当床啦。这个堂屋大约20多个平方米，中间供着他们家的祖先牌位，两边还放着两口“寿木”（即棺材，为老年人百年之后下葬之用，古称寿木。）晚上油灯一点，漆过的

“寿木”荧光闪闪，很是阴森，让人心里发怵。但我转念一想，一个报社记者难道还怕“鬼”不成，心一横，也就安然入睡了。根据7天的跟踪采访，终于写成了3000多字的通讯《革命老妈妈越老越红——记红军时代的乡苏维埃主席、八十高龄的老人张素英》一篇。此稿在通川报发表后，又被四川日报刊登，同时被新华社播发。

洋芋“麻口”

在庙沟乡二村采访他们的优抚工作时，住在一位贫农组长的家里，他家底子薄，没有存粮，什么季节出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时刚栽完秧，正收洋芋。一天几顿都是洋芋为主食，饭是蒸的整坨洋芋，菜是炒的洋芋丝，汤是煮的洋芋片。开始一两天还可以，到了第三天，一吃洋芋口就发麻了。心想早点结束采访，又怕说报社记者吃不得苦，给报社丢面子。自己事小，报社事大，就一声不吭地坚持下去。村长听说组长家没米吃，就提了几斤米来为记者改善生活。到了第

四天，材料总算收集齐了，写成1000多字的通讯《一个优抚工作模范村》，通川报刊登后，西南新华日报也全文刊登。

山中迷路

报社通知要写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深度报道，我赶到曾家乡调查采访，经过10多天的努力，赶写完稿件。由于当时曾家乡没有邮政所，为了赶时间，傍晚6时，我从曾家乡出发，准备赶到罗文区上将稿件第二天一早邮寄回报社。从曾家乡到罗文区公所大约有15公里的崎岖山路，沿途森林茂密，人烟稀少，岔路又多，加之天之将黑，又不熟悉路径，一头闯入“八阵图”中，迷失了方向。令人又急又怕，急的是不辨东西南北，不知路在何方；怕的是遇坏人抢劫或遭猛兽袭击（万源地处大巴山腹地，当时常有野猪和豹子出没）。在漆黑的树林中，摸索了5个小时，才终于到达了罗文区公所。此时已是精疲力尽，一身衣服也被树枝荆棘扯

得破烂不堪。罗文区委书记闻讯后，置酒买菜给我压惊，心中甚是欣慰。（作者系达州日报原编委）



1974年作者在精编稿件。

